

国家、资本市场与多元化战略 在中国的兴衰^{*}

——一个新制度主义的公司战略解释框架

杨 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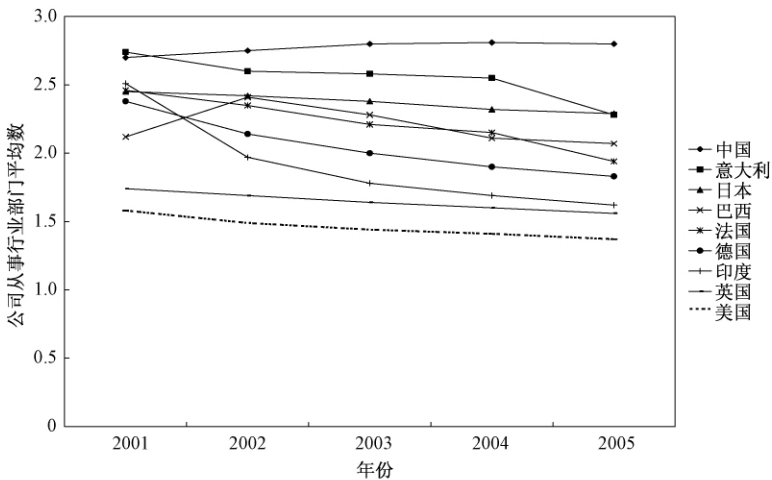
提要: 本文采用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组织分析的理论框架, 强调外部制度环境(国家和资本市场)在塑造大公司内部结构和战略中的作用, 尤其是权力和合法性在组织变革中的关键角色。基于 676 家中国上市公司 2000 - 2007 年间的财务和公司治理数据以及相关深度访谈资料, 本研究发现, 国家政策和资本市场强有力地形塑了上市公司的多元化或专业化战略。尽管多元化对业绩不利, 但我国公司仍热衷多元化并由此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公司多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国家和资本市场利用其政治和市场权力推行的“最佳”公司战略和组织形式, 经由三种“制度同构”机制被企业采纳。本文主要考察了强制性制度同构机制在多元化和回归专业化过程中的作用, 并以此揭示了我国公司进行战略抉择时的制度和社会原因。

关键词: 新制度主义 公司战略 多元化 去多元化 专业化

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 尽管美国大公司广泛采用了集团公司模式(the conglomerate model) 和多元化战略(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 但并没有足够证据表明这些战略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相反,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多元化战略在提高公司业绩、增强公司竞争力方面是无效的。因此至 80 年代, 多元化集团公司模式开始失宠, 提升专业化成了美国大公司在过去 30 年间的战略趋势。比如, 1980 年, 只有 25% 的美国大

* 本文在笔者博士论文第 4 章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在实地调研、数据收集及论文写作过程中受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Shum 奖学金及哈佛博士论文写作奖学金的资助。中国证监会蔡建春、深圳证券交易所金立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云中先生为论文实地调研和资料收集提供了建议和帮助。道宾(Frank Dobbin)、怀默霆(Martin Whyte) 及弗雷格斯坦(Neil Fligstein) 等教授对论文的写作提供了重要指导建议。本文初稿曾在“中国社会学学会 2011 年会”(南昌) 上宣读, 沈原、刘世定、刘少杰、甄志宏、桂勇、王水雄、吕鹏、符平等师友给予了富有帮助的点评和建议。《社会学研究》编辑部提供了中肯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集中于单一行业(a single 2-digit industry) 运营 ,而到 1990 年这一比例达到了 42% (Fligstein ,1991; Davis et al. ,1994; Zuckerman ,1999 , 2000) 。在其他发达国家或新兴经济体 ,也有不少因素在推动公司模仿、采纳美国盛行的专业化战略(Ramaswamy & Li ,2001) 。美国大公司的专业化趋势通过制度同构(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机制在全球各地得以广泛扩散。然而 ,多元化战略却仍是中国企业的主导战略。如图 1 所示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公司多元化程度的比较中 ,中国企业的多元化程度明显比其他所有国家都高。



资料来源:Fan et al., 2007。

图 1 公司多元化程度的国际比较

尽管有大量证据表明 ,多元化并不能显著提高公司业绩 ,有时甚至是成功企业走向崩溃的主要原因 ,但不少中国企业还是争先恐后地实施多元化并以此为荣。这些事实提醒我们 ,中国企业多元化的原因可能与其制度环境密切相关 ,而不单单是市场机制的自然结果。也就是说 ,在中国 ,塑造公司战略的因素除了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声称的效率和利润之外 ,可能还有特殊的社会和制度因素。作为一项尝试 ,本文试图采用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组织分析的理论框架去厘清、分析影响中国企业多元化战略的制度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多元化提供不同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第三种视角。具体来说 ,本文旨在研究

国家和资本市场等外在制度因素对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的影响。

与多元化原因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多元化如何影响公司绩效。虽然多元化在发达国家被认为不是一种好战略,但也有学者认为其在发展中国家可能是一种比专业化更优的战略,会显著提高公司业绩(Khanna & Palepu, 1997),因为在发展中国家,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完善,政府法规和合同的执行力度也不够,而多元化企业集团有自己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在遵守政府法规和履行合同方面比个体企业更有效率和效果,因此,多元化企业的绩效会更好一些。中国多元化企业是否在业绩方面表现的比专业化企业更好?或者说,高绩效是中国企业采取多元化战略的原因吗?为更好地理解中国企业多元化的原因及其后果,首先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国企业多元化发展的历程,并对中国企业的政治社会环境作一简要剖析。

一、多元化战略在中国的兴起和衰落: 1978 - 2008

(一) 多元化公司模式在中国的兴起: 1978 - 199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呈现出从单一企业向多元化企业集团转变的趋势,而且多元化企业的多元化程度也在显著加深。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即多元化战略的鼎盛时期,90%以上的中国上市公司实施了多元化战略,平均业务部门数量超过3个,有些企业甚至涉足12个行业之多。毋庸置疑,中国企业多元化有诸多经济驱动因素,例如快速变化和高度不确定的市场环境(因此企业采取多元化战略以分散风险),从短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产生的各个行业的巨大市场机会(因此企业涉足尽可能多的行业以期获取最大化的机会和利益)。但是,多元化公司模式在中国的广泛盛行也有不少制度因素的推动,特别是国家在塑造公司战略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推行多元化企业集团政策有几个动因。其一,政府认为中国企业应该模仿日本和韩国的多元化集团公司模式,以提高企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其二,中国本土企业与在华运作的大型跨国公司日益激烈的竞争也迫使中国企业快速整合起来,打造多元化“企业航母”以有力应对外资竞争。此外,中国政府也把多元化企业集团当作吸纳日益增多的亏损企业和下岗职工的一个有效途

径。与破产相比,多个企业兼并、重组为一个更大的多元化企业遂成为了更优选择。当时有大量案例显示,各级政府曾主导一些大型国企吸收、合并亏损的中小国企,形成大的多元化集团,这说明90年代中国很多多元化企业集团的建立,更多的是基于政治考虑而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考量(樊纲,1996; Keister, 1998)。

在改革初期,一些学者和官员就提出建立企业集团有助于整合国家经济的想法,但由于缺少相关产业政策支持,加之地方官僚势力的反对,大型企业集团的打造难产。到90年代初,情况才有了根本好转。1993年两个法律政策的颁布成为中国企业集团命运的转折点。第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现代企业制度”作为我国企业改革的关键,呼吁建立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第二个是1993年通过并于1994年7月正式实施的《公司法》。《公司法》连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成为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法律基础和影响我国企业集团战略的重要制度因素。在《决定》和《公司法》颁布不久,国务院在1994年就选择了100家企业和56家企业集团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这些企业在制定经济计划、融资运营和对外贸易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1997年春,国务院把试点企业集团的数量从56家扩大到了120家。中央对企业集团发展的高度重视,在各个部委、省市等层面引起了极大反响,后者纷纷采取各种措施支持中央计划。如,1995年4月,原化学工业部宣布,将大力支持其属下的5个大型企业集团,力争在“九五”期间达到超过100亿元的年销售目标。国务院也于1995年宣布投入1000亿元支持8家重点汽车企业集团的发展。又如,1995年春,上海市政府率先采取措施鼓励企业集团的发展。农业部和地方政府甚至支持在乡镇层面打造乡镇企业集团(Shieh, 1999; 陈清泰等主编, 1999)。各种企业集团随后在部、省、市、县等各层面蓬勃发展。

90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的普遍亏损和经营困难,使得我国政府认识到国企改革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①于是国企改革的战略及核心原则转向“抓大放小”,即集中政府的有限精力和资源扶持大型成功的国企,同时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具体来说,就是将大中型国企转变

① 参见1997年党的十五大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为独立法人实体,并支持其兼并、重组、联合,形成大型多元化企业集团。而小型国企,尤其是那些亏损企业,或被出租,或被并购、出售,甚至被勒令破产(吴敬琏等,1998;张维迎,1999)。“抓大放小”战略的实施对我国企业90年代中后期的多元化浪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后,我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企业集团化改制浪潮。在某些情况下,企业兼并、重组、集团化改制都是在相关政府主管部门一手操控下完成的,而这些监管、操控改制过程的政府机构在集团化改制完成后便成为新企业集团的总部,这些机构的政府官员则成了改制后企业集团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有些企业则通过非相关多元化(unrelated diversification)——从事与企业核心业务很不相关的商业活动——来履行社会责任。如在90年代,我国还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和劳动力市场,就业对政府和社会稳定尤其重要,政府不允许企业随意解雇员工加重本已十分严重的就业形势,因此企业随便裁员是行不通的(李培林、张翼,2007),但根据相关政策,企业可以把车间及其他服务设施转化为“附属三产公司”,从事母公司核心业务以外的商业活动,例如房地产管理、酒店及维修服务(Guthrie,1997)。面对计划和市场的双重压力,非相关多元化为那些继承了沉重历史包袱的大型国企提供了既能提高核心竞争力,又能转移过剩人力资源的有效方法。总之,对于我国企业的多元化政府起着关键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的多元化集团改制政策推动的。

(二) 多元化战略的衰落:后1997时期

1997年是中国企业多元化进程的一个分水岭,“多元化热”自此逐渐冷却下来。这一年,亚洲金融危机及几个著名多元化集团的突然倒闭(如巨人、三株和太阳神集团),引发了商界和学术界关于中国企业究竟应该采取多元化还是专业化战略的大讨论。尤其重要的是,多元化集团公司模式被认为是导致韩国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不少人开始担心中国效仿韩国大力推动多元化企业集团的政策也许是不明智的。而中国政府和企业集团之间的密切关系也让人更加担忧,危机一旦发生,其后果可能更加严重。反思日、韩多元化集团模式的负面效应,加上观察到美国专业化公司模式在全世界的风行,中国高层领导人和决策者开始将目光转向看似更优的美国模式。相应地,很多中国企业开始实施去多元化以提高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y)。例如,1997年

实施兼并重组的 95 家上市公司中,有 14 家剥离了非核心资产;在 200 家进行重组的企业中,有 50 家出售了非核心业务。

自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在新的国家政策和美国专业化公司模式的强大影响下,中国企业出现了去多元化的新趋势。如图 2 所示,尽管中国企业的多元化程度在总体上仍然很高,但从 2001 年到 2007 年出现了明显下降:①2001 年 85% 以上的企业从事多个行业,而这一比例在 2007 年下降到 70%;衡量企业多元化程度的指标熵指数(the entropy index)也从高峰年 2001 年的 0.56,大大降低到 2007 年的 0.42。此外,数据显示 2001 年中国上市公司从事的平均行业个数超过 3 个,而到 2007 年下降到 2.6 个。

从图 2 可以清楚地看到,2001 年到 2007 年企业多元化的两个重要指标都呈下降趋势。此外,人们谈论企业战略的话语和论调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实地调研期间,笔者强烈感受到专业化这一中国商界的新时尚和大家对此的谈论热情。公司高管、学者和商业媒体经常讨论中国企业为什么要专业化而不是多元化,还常常举例说因为全球财富 500 强几乎都是专业化企业,所以中国企业若想进入 500 强就应该采取专业化战略。专业化论调如此强大,以至于有的连锁酒店出售了其餐厅业务,只因为商业顾问和媒体认为,酒店管理而非餐厅运营才是其核心业务。中国农业和食品工业最大的一家公司总经理 N 先生就抱怨说“专业化战略在中国已经走得太过了……我也曾被 M 咨询公司所误导,去多元化得非常厉害,以至于把几乎所有有利可图的资产和

① 相反,图 1 显示中国企业多元化在 2001 年到 2005 年期间呈微幅增长趋势。图 1 和图 2 的差异主要是由取样方法和样本企业的不同而引起。图 1 引自范博宏等学者(Fan et al., 2007)的研究,他们把 2001 年到 2005 年中国所有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这意味着他们的样本数量是逐年变化的,每年都有新公司加入。图 1 的数据能够很好地展现中国上市公司的整体多元化程度,但由于每年公司样本不同,无法获得同一批公司多元化程度的变化情况。更重要的是,本研究的数据与采用的理论框架更相关,因为本文的核心论点是国家和资本市场在塑造公司战略(例如去多元化战略)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非上市公司和刚上市公司在去多元化中并没有受到太多来自国家政策和资本市场的压力,所以如果我们想确切知道国家政策和资本市场对中国企业去多元化的影响,就应该排除这些公司。而图 2 正是在此基础上,以笔者自己的样本(1997 年到 2007 年 676 家上市公司)反映出所跟踪的同一批公司过去 10 年来多元化情况的变化,所以本研究的数据在衡量中国企业多元化的趋势上应该更准确。整体上来看,尽管中国企业多元化程度仍然很高,但 1997 年后有显著的去多元化趋势。另需说明的是,图 2 中 2006 年多元化程度的突然加深是由股票市场的繁荣引起的:我国股票市场在 2006 年成倍增长,很多上市公司都开始从事投资业务(在上市公司年报中会被当作一个新的业务部门),这是导致 2006 年上市公司业务部门平均数激增及多元化程度暂时飙升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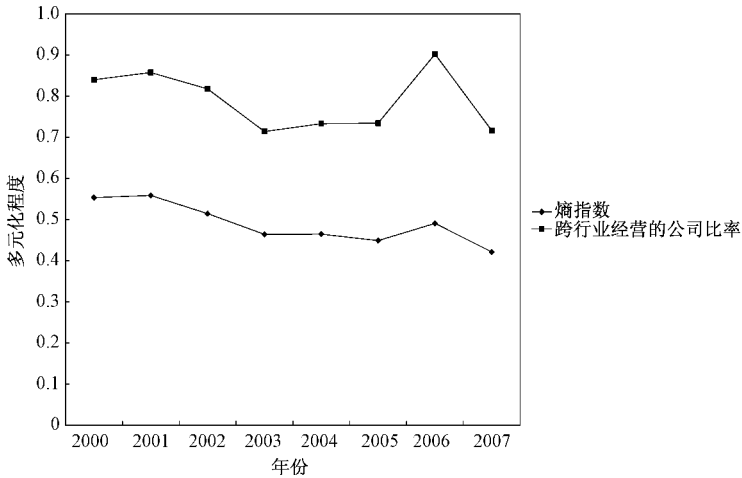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的衰落(2000 - 2007)

业务(例如房地产)都出售了,只留下了 M 咨询公司所认定的核心业务(但都是一些非盈利的业务),例如农产品业务,这最终导致我们的业绩变得很差……后来我们为了恢复到之前的盈利水平,只好又买回一些赚钱的业务”(公司高管面访 E01)。

二、理论综述与理论框架

(一) 效率、理性与多元化战略

企业为什么要进行多元化的问题受到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的广泛关注和研究,由此产生了几种理论解释框架。首先,有学者用规模经济效应(economies of scale and scope)来解释多元化战略的动因,并由此认为多元化对企业绩效有积极作用(Chandler,1962; Rumult,1974)。企业通过在更大规模上运用其固定资产投资(如市场营销和研发)能够获得更大收益,也能够通过把一些商业活动中的战略资源和独特能力运用到其他商业活动中来提高盈利。企业资源基础观(Barney,1991)和动态能力论(Teece et al.,1997)为该理论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其次,是组织学习理论和企业经营范围再定义理论。明茨伯格(Mintzberg,1988)把公司战略重新定义为几类“一般战略”。根据这种

分类,多元化战略属于“扩展核心业务”类别的一部分。企业通过扩展核心业务加深对市场的理解,并有可能重新定义核心业务或产品市场领域。而多元化战略会影响企业未来的战略变化和长远公司绩效。多元化尤其是非相关多元化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能降低风险(Chandler,1962)。公司高管可以通过非相关多元化提高公司绩效,尤其是当企业处于不确定或恶劣环境中的时候。最后,多元化战略的一个负面作用可以用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来解释。公司高管会倾向于控制更大的企业,即使这种由多元化驱动的规模增长会降低股东价值(Denis et al.,1997)。特别是如果高管薪酬与公司规模密切相关的话,高管就会更倾向于多元化(Jensen & Murphy,1990)。此外,蒙哥马利(Montgomery,1982)认为公司管理者会通过实施多元化战略以降低他们自身的雇佣风险。

(二) 公司多元化: 一个新制度主义的解释框架

如前文所述,1997年以前多元化战略在中国企业中风行一时,然而1997年后却突然出现了衰落趋势,如果真如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所言,多元化是有利于企业效率提升和业绩提高的最佳战略,那么,此战略应该长期为企业所用并更普遍地扩散开来,而不是短短几年间就突然转向衰落。在很多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眼里,“理性”和“效率”是客观的,存在于社会和制度真空中,并不随外在制度、文化和社会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如果多元化是最理性、最利于效率最大化的战略,为什么企业会放弃该战略而进行去多元化、回归专业化呢?难道企业作为理性行动者,突然变得不理性了吗?

显然,上述种种基于“效率”和“理性”的理论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关于中国企业多元化战略的合理、满意解释。而社会学家对美国等西方企业多元化和去多元化历程的研究为我们理解中国企业的多元化和去多元化问题提供了颇为有用的经验参照和理论启示。与基于效率的视角不同,社会学家着重从制度、社会和政治视角解释多元化战略的兴起和衰落。他们认为多元化集团模式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通过一系列制度过程建构并扩散开来,这些制度过程包括国家行为、组织模仿、商业咨询顾问们的建议,以及组织理论家的效率逻辑论的支持等(Fligstein,1991; Davis et al.,1994)。弗雷格斯坦(Fligstein,1985,1987,1991)认为,公司在某段时期的经营决策和商业实践反映了该时

期的宏观制度和结构状况。通过将组织战略与其制度环境联系起来,他发现,企业内部的个体行动者、企业的经济和结构状况,以及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对企业决策和实践都很重要,那些处于快速社会转型和大变革时期的企业尤其如此。根据弗氏的分析,在美国多元化战略的产生主要受两个制度因素的强烈影响:其一,被政治定义的制度环境通过反垄断法和相关政策塑造了企业的多元化实践;其二,随着一些企业率先实施多元化战略,这一组织实践通过迪马吉奥和鲍威尔(DiMaggio & Powell, 1983)所提出的“制度同构”机制在组织场域内进行快速传播,尤其是通过强制和模仿机制。此外,弗氏还强调了组织内部政治因素在多元化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有销售、市场营销和财务运营背景的首席执行官(CEO)会更偏爱多元化战略。总体来看,弗雷格斯坦等社会学家关于多元化战略的社会学解释比那些以效率为基础的多元化理论要更为深入、细致,视野也更为宏大(比如 Coase, 1937; Chandler, 1962; Williamson, 1975)。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民族国家(nation-states)在现代世界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迫使企业遵从国家相关制度和法规的压力也与日俱增(Meyer & Rowan, 1977)。迪马吉奥和鲍威尔(DiMaggio & Powell, 1983)着重强调了国家和专业人士在一项组织实践产生及扩散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在现代世界,理性和科层化的动力已由竞争性市场转向国家和专业人士。即使在美国这样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在推动一些组织实践的产生和扩散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美国大公司中一些劳动和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均与国家相关法规政策的影响有关(Baron et al., 1986)。另外,国家在一些组织实践的跨国扩散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Guillen, 1994),例如科尔(Cole, 1989)就描述了日本政府如何在日本企业的质量管理运动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国家一般通过提供激励(或实施惩罚)来推动组织的转型和变革。专业人士也在新型组织实践的产生和扩散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比如,基金经理和证券分析师等专业人士在推动美国公司实施专业化战略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Zuckerman, 1999, 2000)。

在我国,由于国家在全社会中的主导作用,特别是由于计划经济传统,企业并非是完全独立于政府的自主市场行动主体,企业的很多决策,特别是像多元化这样的重大决策,往往受国家政策和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强烈影响,因此,国家的强制(coercion)在塑造我国企业行为方

面尤为重要。另外,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由于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分析师等对公司市值及声誉的影响力,资本市场在形塑公司战略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基于中国现实和上述新制度主义组织分析的有关理论,本文试图提出一种不同于传统经济学和管理学解释的新制度主义公司战略分析框架来理解多元化战略在中国的兴起和衰落。这种新制度主义公司战略观强调权力及合法性(legitimacy)在形塑公司战略方面的重要作用(Fligstein,1991; Roy,1997; Perrow,2002),同时着重外部制度因素——特别是国家和资本市场作为两个强大外在制度力量——在形塑公司内部发展战略中的作用。凭借这种新制度主义公司战略观,我们可以从一个既包括经济因素又包括制度因素的更全面而周密的理论视角来审视中国公司的多元化,加深我们对中国公司战略的理解。

三、理解中国企业的多元化:几项假设

“国家”无论对理解宏观中国经济还是微观中国企业行为都是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在公司战略方面,如前所述,无论是多元化还是之后的去多元化,中国政府都起了重要作用。本部分涉及国家作用的假设主要是国有股权和公司行政级别,这两个变量都与公司受国家力量影响的强弱有关:国有股比例较高及行政级别较高的公司与国家联系更紧密、受国家的影响也更大。另外,尽管我国资本市场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但已显示出在塑造上市公司发展战略方面不可小觑的力量。本部分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来测量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力。

(一) 国有股权与公司多元化

要想了解中国企业为什么偏爱多元化战略,就必须考虑中国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基于美国经验的研究显示所有权与很多战略都密切相关,其中就包括多元化战略(Hoskisson & Turk,1990)。作为一个涉及企业经营领域的战略变量,产权类型往往与整个公司层面的重大决策有关(Gedajlovic,1993)。这从产权与交易成本理论的联系中可以清楚看出(Williamson,1985)。但是,产权类型对于转型期中国企业的多元

化战略来说具有超越降低交易成本的更关键意义。

一般说来,国有制使企业更倾向于多元化。尤其在中国,政府推动和国企高管偏好同时起作用,从而使国企更偏爱多元化。前文也提到,政府会推动其属下的企业多元化,建立大型企业集团,以期提高企业竞争力,推动经济发展。政府还会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和增加就业而推进多元化(Li et al., 1998)。因此,在中国,多元化不仅仅是企业自主的战略选择,而且更是国家权力和行政强力干预的产物。此外,国企领导人面临的“制度激励”及“利益刺激”也是推动国企多元化的重要原因。由于国企经理面对的是软预算约束,因此他们往往很随意地实施多元化。国企经理们也很乐意用多元化这种更易于为外界观察(特别是其上级主管部门)的战略来作为企业的战略发展方向。因为规模扩张是企业增长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也是政府官员和职工都希望看到的,所以国企经理往往通过多元化来扩大公司规模、提高自身的职位和权力。此外,寻租行为也是多元化的推动因素之一。国企老总可以方便地从多元化投资中获得不少收益(如,直接贪污投资资金,或从承包商处获取回扣和贿赂)。

基于以上理论和事实,我们不难预测国有企业会比非国有企业更可能实施多元化战略。1997年以前这也许是正确的。但是,1997年后我国的企业多元化政策发生了急剧转变。上文曾提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放弃了日、韩的多元化企业集团模式,转而推动中国公司实施美式专业化战略。因此,中国政府近些年来在企业的去多元化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总的来说,中国政府的角色正逐渐从国有企业的微观管理者向大型企业或金融机构的战略投资者转变。特别是2003年成立国资委和2007年成立中国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中投)后,中国政府越来越像投资者和掌管投资组合的超级基金经理,而不是具体负责公司运营的管理者。目前,国资委是中国最大工业企业的控股股东:截至2010年7月,它控制了125家大型工业企业,包括中石油、国家电网、中国电信等,这些都是名列财富全球500强的企业。中投公司则是中国最大几家金融机构的控股股东(通过中央汇金公司):它控制了4大商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此外,中投公司还拥有类似私募股权投资的部门(所谓的主权财富基金),对世界范围内尤其是美国的工业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投资,它拥有美国一些最知名公司的股权,包括摩根斯坦利、花

旗、苹果、可口可乐、强生、摩托罗拉和维萨等公司。

国资委自成立以来,出台了关于国有企业去多元化(或至少要限制其过度扩张)的一系列规定。2002年原国家经贸委等八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对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提出具体操作办法。该文件的下发,改变了国企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大而全,小而全”的主导模式,开始引导央企向“主业为王”的道路上发展。2003年7月,在国资委成立后的第一次央企负责人会议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定下了央企整合、突出央企主业的调子。其思路是,央企“先做强,再做大”。做“强”就是把主业做上去,主业不要超过3个,不要把摊子铺得过大,过大的要逐步收缩。他着重指出,央企主业不突出、核心竞争力不强的问题比较突出。一是相当一批企业主业过多。据统计,央企存在4个及以上主业的有53家,占央企的28%,最多的达8个。二是部分企业尚未明确主业方向,仅有约50家企业主业比较明确。三是央企之间存在结构趋同、相互竞争现象(朱江雄,2005)。李荣融为央企投资划定“三条红线”,其中一条即“不符合主业投资方向的坚决不准搞”。2004年,国资委下发了一系列通知,包括《关于加强中央企业重大投资项目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加强中央企业收购活动监管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央企业发展战略和规划管理办法(试行)》等,要求各央企做好主业,剥离非主营业务。2005年又下发了《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2006年7月,《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其中一项重要原则是“突出主业,有利于提高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国资委该办法出台的背景是“少部分企业非主业投资比重偏大,存在盲目多元化投资问题,投资管理上漏洞和隐患较多,亟待加强监管”。自2004年国资委开始对央企的主业一步步明确以来,先后8次公布央企主业名单(武孝武,2007)。

而中投公司的投资风格与美国典型的机构投资者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中投公司的不少高管都是之前在华尔街投行或律所工作的专业人士)。来宝集团董事长埃尔曼(R. S. Elman)就认为,中投公司高管的投资方式很有效率,“他们非常商业化,只注重结果,并不干预所投公司的日常运营”(Barboza & Bradsher, 2010)。除了国资委和中投公司,中国证监会在推动上市公司专业化战略上也起了很大作用。例如,它明确规定通过股市筹集到的资金只能用于发展核心业务,否则筹资

申请将被驳回。

中国政府官员从“经理人思维”(managerial mentality)到“投资者思维”(investor mentality)的转变有诸多因素。很多政府官员都是学经济和法律出身的,有些在商业和金融领域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这种教育背景和专业经验极大影响了他们对公司战略的理解,使其理所当然地认为专业化要优于多元化(比如经济学理论和商学院教科书就明确声称专业化要优于多元化)。美国公司重回专业化的风潮也影响了他们的想法。总体来说,中国政府官员从“经理人思维”到“投资者思维”的转变,深刻影响了中国政府对公司战略的认识。与华尔街的机构投资者一样,如今中国政府也更倾向于专业化公司,并要求国有控股企业逐步去多元化。与此同时,中国很多私营企业却由于没有政府约束和行政指导,仍在非常积极地向多元化发展。初步数据分析显示,在2000年到2007年期间,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多元化程度明显高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由于我国公司的去多元化和重归专业化主要是由国家驱动和引导的,而较少由企业自身自觉、自愿而达成,因此,那些国有股比例更高的上市公司由于与国家的联系更紧密、受国家政策的影响更大而更有可能实施去多元化战略,其多元化程度由此可能更低。所以,我们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1:在2000年到2007年,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股的比例越高,其公司的多元化程度越低。

(二) 企业行政级别和多元化

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围绕着“层层嵌套”的庞大政府机构而组织起来,每一级政府都有一些自己控制的企业。相应地,这些企业也有不同的行政级别,比如由省级政府管理的就是省属企业,由市级政府管理的就是市属企业。倪志伟(Nee,1989)认为当市场机制作用加强时,这种计划经济的等级制就会消失,但其他学者(比如Guthrie,1997)断定这种范式转移在短期内不大可能实现。尽管经济责任和行政责任已经下放,但这一官僚等级制本身并不会消失。魏昂德(Walder,1995)的研究显示不同行政级别的政府治理环境对公司实践有显著影响。行政级别越高的公司,其市场或政治权力也越大,越容易获得政府提供的资金和各种资源,因此也就比行政级别低的公司更有能力、也更有可能是实施多元化。但顾道格(Guthrie,1997)发现行政级

别较高的企业更可能实施多元化,不是因为它们拥有更多的资源及更大的市场和政治权力,而是因为它们在经济改革中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大,为了分散风险并在市场中生存下来,它们更可能实施多元化。总之,无论是基于何种原因和机制,已有不少证据表明行政级别越高的企业在 20 世纪 90 年代越有可能实施多元化。

然而,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中央关于公司战略的新政策重塑了那些行政级别较高的大公司的发展战略。比如,随着上述国资委一系列“突出主业,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政策的出台,各个央企纷纷有所行动:2007 年 12 月,中石化集团向外界传递出拟转让旗下金融资产的信息;2008 年 6 月,中石油对外宣布,本着突出发展主营业务、核心业务的原则,清理现有投资项目和规划中的项目,将对 49 个项目做停缓建或调减投资处理(家路美 2008)。

尽管中央正力推企业专业化,但范博宏等人(Fan et al., 2007)发现不少省市等地方政府仍在强力推动其所属企业朝特定行业进行多元化扩张,尤其是向那些所谓的“支柱产业”。例如,我国除两个省外都进入了汽车装配行业,结果是大多数企业规模都很小且很难盈利。显然,有很多经济因素(例如不同的利益激励机制)造成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多元化持不同观点,而其间政府官员对公司战略的不同理解也起了重要作用。中央政府官员和省市县等地方官员相比,受过更好的教育和专业训练,并更多地受到国外专业化公司模式的影响。因此,中央政府官员会认为专业化是当今企业的标准规范和值得中国企业学习的全球最佳实践样板,而地方政府官员可能会真的认为多元化才是更好的战略(比如他们会觉得企业越大越好,从事的行业越多越有实力)。此外,由于行政级别高的企业在其所在行业更大、更强,它们更可能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例如品牌和专利技术),从而更有能力实施专业化。核心竞争力事实上是个奢侈品——并不是每个企业都拥有能够支撑其实施专业化的核心竞争力。很多企业由于没有核心竞争力,为了生存只能多元化发展,尤其是私营企业和行政级别较低的国有企业。总之,行政级别更高的企业更可能实施去多元化战略,不仅仅因为它们受中央政府专业化政策的影响更大,也因为它们更具有实施专业化战略的能力。由此,我们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 2: 2000 - 2007 年,企业的行政级别越高其多元化程度越低。

(三) 资本市场与公司多元化

研究表明, 证券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在美国大公司的去多元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Zuckerman, 1999, 2000)。据朱克曼(Zuckerman, 1999, 2000) 分析, 一个公司的股票在“报道错位”(coverage mismatch) 的情况下会出现折价贬值交易。“报道错位”是指该公司的股票没有被其所在行业的分析师所关注、分析和报道。这种“报道错位”对多元化公司来说问题尤为严重, 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多元化公司的股票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一直处于折价交易的状态。因此, 多元化公司的高管们迫于压力而实施“去多元化”, 以使其股票更易于被分析师理解, 从而提高公司价值。关于机构投资者在多元化中的作用, 研究发现所有权的集中度与多元化程度有负向关系(Hoskisson & Turk, 1990), 这意味着所有权集中于机构投资者(如共同基金、养老基金等) 手中能有效抑制公司管理层的过度多元化冲动。博伊德等人(Boyd et al., 2005) 也证实机构投资者在限制公司管理层出于自身利益而追求非相关多元化方面能够发挥很重要的监督制衡作用。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 我国资本市场取得了很大进步。尽管还存在种种不足, 但资本市场在改善公司治理、形塑公司战略方面已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自 2005 年股权分置改革以来, 资本市场中机构投资者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我国的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分析师们与其全球同行一样, 都希望公司有明确的主营业务及核心竞争力, 对那些主营业务不清、过分多元化的公司要么调低其估值, 要么“用脚投票”, 敬而远之。许多证券分析师在为公司股票评级时, 往往将主业是否突出当作其未来赢利能力的一个标志, 如三九药业在剥离了非主业资产后, 证券分析师提高了其评级。在实地调研中, 当笔者问一些证券分析师是否喜欢多元化公司以及如何评估这些公司的价值时, 一位分析师回答说“我们在制定投资组合时几乎不考虑多元化公司, 无论它们的业绩有多好”(分析师访谈 S01)。因此, 面对资本市场的压力, 上市公司不能过分多元化, 而要将主要精力集中于一个或若干个核心业务上。然而, 尽管所有上市公司都会受到资本市场的影响, 但由于各个公司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非常不同(多的可能占到公司总股份的 50% 以上, 少的可能连 1% 都不到), 因此各个上市公司所受的资本市场压力是不一样的, 那些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 所受到的专业化压力也就越大。因此, 我们的第三个假设是:

假设 3: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其多元化程度越低。

(四) 多元化和公司绩效

多元化如何影响公司绩效一直是战略管理和产业组织的研究重点 (Chandler, 1962; Rumelt, 1974)。产业组织经济学家首先考虑多元化和非多元化企业的相对绩效;接着,战略管理和金融领域的学者提出了更明确具体的研究范式,重点研究相关多元化和非相关多元化的绩效差异 (Rumelt, 1982; Galai & Masulis, 1976)。对此,虽然有很多实证研究,但并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既有研究发现多元化和公司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Campa & Kedia, 2002),也有研究发现两者没有显著关系 (Villalonga, 2004),还有研究发现两者存在负向关系 (Lang & Stulz, 1994),甚至一些学者发现多元化水平和公司绩效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 (Palich et al., 2000)。

关于多元化和公司绩效的研究大多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些国家的各种市场制度相对完善,企业能够对市场状况做出有效反应。基于新兴经济体的战略研究,却发现了多元化和公司绩效之间的新关系 (Chang & Hong, 2002; Khanna & Palepu, 1997)。肯纳和派勒普 (Khanna & Palepu, 1997) 指出新兴经济制度环境的五个关键特征作为研究多元化和公司绩效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具体说来,新兴经济体缺乏完善的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还缺乏必要的法律法规和强有力的合同约束,因而其中的企业很难积累资源、实施专业化。在这种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中,企业应该实施非相关多元化,作为一种获取自发 (self-generated) 制度支持的有效手段 (Khanna & Rivkin, 2001)。因此,在新兴经济体中,多元化集团比单个公司在这五个方面都更有优势,因而更能提升企业价值 (Lins & Servaes, 2002)。

作为计划经济转型和新兴市场的混合体,中国具有新兴经济体的大部分制度特点。如,在中国很难建立和维护品牌,费力创建的品牌和形象可以被仿冒品牌很轻易地毁坏。消费者没有可靠的信息来源来判断产品质量。资本市场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市场纪律尚未完全建立和执行。劳动力市场仍然分散且不透明。尽管商业教育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优秀管理人才的数量还远远不够。法律法规还在发展完善中,合同执行力也不容乐观。这样一个典型的新兴市场制度特征使我国成为验证多元化对企业绩效影响的理想环境,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4: 在中国多元化程度和企业利润率成正向关系。

假设 5: 在中国多元化程度和股票回报率成正向关系。

假设 6: 在中国多元化程度越高的企业增长越快。

四、数据和研究方法

(一) 样本

上市公司多元化数据以及会计和财务数据主要从上市公司年报、中国股票市场和会计研究数据库(CSMAR)及万德(Wind)数据库中搜集整理而来。所有制结构和公司治理数据主要来自色诺芬(Sinofin)信息服务数据库。中国证监会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其所从事的所有主要行业部门的详细信息,只要这些行业部门超过该企业总体销售额、资产或利润的一定比例。披露信息包括行业名称、产品和服务描述,以及行业部门的销售、成本和利润情况。笔者从上市公司年报和 Wind 数据库中收集 2000^①年以来的数据,并进行编码,最终得到 2000-2007 年 676 家上市公司的多元化数据。此外,还对基金经理、证券分析师、上市公司高管等进行了深入访谈,并对《财经》、《中国企业家》等商业杂志进行了文献综述分析,作为对定量数据的补充。

(二) 测量指标

1. 因变量

多元化程度: 本研究用基于销售的熵指数来衡量多元化程度。^②熵指数既是自变量又是因变量。作为因变量,用来验证假设 1、2 和 3; 作为自变量,验证假设 4、5 和 6。本研究选择了 3 项绩效指标: 用利润率(profit margin)来衡量盈利能力; 用年股票回报率(stock return)来衡量股市表现; 用年销售额增长率来衡量企业增长。

2. 自变量

国有股比例: 国有股占总股份的比率。公司行政级别: 虚拟变量, 1

① 也有 2000 年之前的一些零散数据,但数据质量很差。

② 熵指数是将每个业务部门的销售额占公司总体销售额的比率(P_i)乘以 $1/P_i$ 的对数,然后加总求和,即 $E = \sum_i P_i \times \ln(1/P_i)$ 。当企业完全专业化时 E 取最小值 0,但是 E 没有上限。 E 值越大说明多元化程度越高。

= 非国有控股企业 2 = 县及乡镇政府控股 3 = 市政府控股 4 = 省政府控股 5 = 中央政府控股。机构投资者^①持股比例: 所有机构投资者持股量占总股本的比例, 用来衡量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程度。

3. 控制变量

基于相关文献和中国企业的特点, 本研究选择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外资股比例(外资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大股东控股比例(控股大股东所持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沿海地区^②(虚拟变量, 公司注册所在地属于: 1 = 沿海地区 0 = 非沿海地区)、总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总资产)、公司规模(公司总资产取对数)、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行业和年度(虚拟) 变量。具体来说, 绩效越好的公司越可能多元化, 因为它们多元化的能力更强, 也有充足的资本和管理经验成功实施多元化(Lang & Stulz, 1994)。但顾道格(Guthrie, 1997) 发现在中国财务绩效越差的公司越可能进行多元化, 因为这些公司在快速经济转型中为生存而努力挣扎, 而在低风险、快回报的服务业进行多元化发展是获得稳定和生存的理想途径。另外, 规模越大的企业产生的利润也越多, 从而更有能力应对风险, 所以大企业更倾向于多元化(Denis et al., 1997)。另一个重要的控制变量是资本结构, 多元化需要大量资金投入, 因此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企业是不太可能采取多元化战略的, 因为它们既不能从资本市场融资又缺乏自有资金来实施这项战略(Stearns & Mizruchi, 1993)。此外, 行业结构特征可能也会促使企业实施多元化。最后, 本研究把年份也作为一个控制变量, 以验证中国企业多元化程度是否随时间推移而递减。

表 1 列出了回归分析中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我们可以看到变量之间所有显著的相关系数都低于 0.5, 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三) 模型

控制变量会出现在所有模型中, 因为它们既影响多元化程度又影响企业绩效。所有自变量和控制变量都是因变量前一年的数据(即滞

① 主要指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及共同基金等专门进行有价证券投资活动的法人机构。

② 包括以下东南沿海省市: 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

后型数据 ,lagged data) ,以更好地厘清自变量和因变量两者的因果关系。因为是纵贯面板数据(panel data) ,违反了非关联误差的假设 ,本研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以应对面板数据中常见的误差项的未被观测到的异质性(unobserved heterogeneity) 。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1	2	3	4	5	6
观察值	3816	6198	2379	6138	6132	6120
均值	.479	.407	.038	.149	.0127	.516
标准差	.435	.257	.067	.217	.193	.981
1 熵指数	1					
2 国有股比例	-.12***	1				
3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11***	-.034*	1			
4 外资股比例	.053***	-.59***	-.017	1		
5 总资产收益率	.018	.099***	.146***	-.03**	1	
6 资产负债率	-.05***	-.031**	-.033	.015	-.3***	1

注: * $p < 0.1$,** $p < 0.05$,*** $p < 0.01$ 。

五、模型分析结果

(一) 多元化程度

表 2 显示了验证假设 1、2 和 3 的结果。国有股比例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且显著 ,意味着国有股比例越高 ,多元化程度越低。因此 ,假设 1 得到验证。所有行政级别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是负值 ,但只有县乡镇和中央政府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 ,这说明两点:第一 ,总体上来说各个级别的国有控股公司多元化程度低于非国有控股公司;第二 ,行政级别和多元化程度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而是一种倒 U 曲线关系 ,即级别最低的(县乡镇控股企业)和最高的(中央控股企业)多元化程度均较低 ,而中间的省企和市企多元化程度较高。但县乡镇企业和央企多元化程度较低的成因可能有所不同 ,县乡镇企业是由于能力和资源有限而无法提高多元化程度 ,而央企是因为国家政策限制和专业化意识较强而不能或不愿去提升多元化水平。总之 ,假设 2 只部分得到

表 2 中国上市公司多元化程度的随机效应估计模型 (2000 - 2007)

	多元化程度 (熵指数)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国有股比例	-.1774 *** (.04)		-.196 *** (.05)
上市公司行政级别(非国有控股企业为参照)			
县乡镇控股企业		-.1038 ** (.04)	
市政府控股企业		-.0213 (.02)	
省政府控股企业		-.0227 (.02)	
中央政府控股企业		-.0549* (.03)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7304 *** (.15)
外资股比例	-.0657* (.04)	.0322 (.03)	-.1188 ** (.05)
沿海地区(沿海=1)	.0538 *** (.02)	.0608 *** (.02)	.07 *** (.02)
总资产收益率	-.0296 (.04)	-.0282 (.04)	-.0014 (.07)
公司规模	.0037 (.01)	-4.60E-04 (.01)	.0054 (.01)
资产负债率	-.0559 *** (.02)	-.0551 *** (.02)	-.0501* (.03)
行业(制造业为参照组)			
商业	.0547 ** (.03)	.0626 ** (.03)	.1069 *** (.04)
综合	.3269 *** (.02)	.3373 *** (.02)	.262 *** (.03)
公用事业	.1283 *** (.02)	.1154 *** (.02)	.1355 *** (.03)
地产业	.1967 *** (.03)	.2 *** (.03)	.1656 *** (.04)
金融业	-.1699* (.09)	-.1439 (.09)	-.2065* (.12)
年份(1999年为参照组)			
2000	.0016 (.04)	.0047 (.04)	
2001	-.0299 (.03)	-.0271 (.03)	
2002	-.0674 ** (.03)	-.066 ** (.03)	
2003	-.0662 ** (.03)	-.0635 ** (.03)	
2004	-.0798 ** (.03)	-.0766 ** (.03)	-.0049 (.03)
2005	-.0395 (.03)	-.034 (.03)	.05* (.03)
2006	-.1131 *** (.03)	-.1013 *** (.03)	-.0137 (.03)
常数项	.4766 *** (.15)	.4997 *** (.15)	.462 ** (.21)
N	3759	3759	2039
R ²	.0976	.0927	.0856

注: 括号内是标准误差。在模型 3 中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只有 2003 年以后的数据。

* p < 0.1, ** p < 0.05, *** p < 0.01。

了验证。假设 3 认为机构投资者会迫使企业去多元化,而统计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且显著,这验证了假设 3 是正确的。至于各个控制变量,外资比例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且显著,说明外资持股比例越高,多元化程度越低。结果还显示,沿海企业比内陆企业多元化程度更高。总资产收益率和多元化程度没有显著关系,意味着在中国环境下,绩效好和绩效差的企业实施多元化的可能性是基本相同的。公司规模与多元化程度也没有显著关系,说明无论大型还是小型企业都很可能实施多元化。2002 年到 2006 年的年度变量回归系数大多呈显著的负值,意味着在过去几年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上市公司有去多元化的趋势。

(二) 公司绩效

验证多元化对公司绩效的作用时往往存在一个相互依赖性(simultaneity)问题(Martin & Sayrak 2003)。多元化能影响公司绩效,而公司绩效也能影响多元化。本研究通过滞后的熵指数的方法来纠正这种相互依赖性。表 3 呈现了 3 个绩效指标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多元化程度和利润率没有显著关系,说明即使在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中,多元化对公司绩效也没有积极影响。但是,与代理理论的预测相反,多元化也没有降低企业的利润率。关于多元化程度对股票回报率的影响,熵指数的回归系数在显著性为 1% 的水平上为负值且显著,意味着提高多元化程度会损害公司绩效、降低股东价值。也就是说,即使在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中,多元化的收益也不足以弥补由于资本分配不合理和代理问题所导致的高昂成本。与假设 6 的预测相反,回归结果显示多元化会减缓企业成长。这一结果颇为令人吃惊,因为它和所有传统理论预测都不一致(无论是代理理论还是其他战略管理理论)。但我们可以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提供一种解释:多元化能否促进企业成长取决于企业的制度环境。在统一、大规模的全国性市场(如美国),销售经理能够把本行业的销售和市场经验很便利地运用到其他行业,即他们的销售经验不是行业专有的(industry-specific),而能在不同行业间进行移植。但我国是一个地区和行业分割非常严重的市场(很大程度上是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进入壁垒造成的),再加上中国社会重视关系,销售往往也是关系型和长期导向的,因此企业的销售经验很大程度上往往局限于某些行业和地区,而不具有全国性及跨地区、

跨行业的通用性。我国市场的这些特点使得企业在进入新的行业和地区时,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精力和资源与新客户从头建立值得信任的长期关系。这种特殊的市场结构和制度环境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多元化反而会抑制企业成长。

表3 多元化和中国上市公司绩效(2000-2007 随机效应多元回归模型)

	绩效指标		
	模型 1(利润率)	模型 2(股票回报率)	模型 3(销售增长率)
熵指数	. 1033 (. 11)	-. 0799 *** (. 02)	-. 5195 *** (. 13)
控股股东控股比例	. 2056 (. 29)	. 0165 (. 05)	-. 1501 (. 34)
外资股比例	. 2316 (. 22)	. 0257 (. 04)	. 778 *** (. 26)
沿海地区(沿海 = 1)	-. 1677* (. 10)	-. 045 ** (. 02)	-. 0846 (. 12)
公司规模	. 1841 *** (. 05)	. 0633 *** (. 01)	-. 1408 *** (. 05)
资产负债率	-. 5986 *** (. 05)	-5. 40E -03 (. 01)	. 0035 (. 03)
行业(制造业为参照)			
商业	. 1301 (. 16)	-4. 00E -04 (. 03)	. 0806 (. 19)
综合	-. 1101 (. 15)	3. 15E -02 (. 03)	. 2001 (. 18)
公用事业	-. 0264 (. 15)	8. 30E -05 (. 03)	-. 0196 (. 18)
地产业	-. 0627 (. 19)	. 0293 (. 04)	1. 379 *** (. 22)
金融业	-. 1889 (. 70)	-. 1012 (. 10)	. 276 (1. 00)
年份(2000 年为参照)			
2001		-. 8983 *** (. 04)	
2002	-. 2216 (. 21)	-. 8719 *** (. 03)	. 3448 (. 25)
2003	. 0252 (. 20)	-. 7976 *** (. 03)	. 2371 (. 23)
2004	-. 1187 (. 19)	-. 8637 *** (. 03)	. 0755 (. 23)
2005	-. 0012 (. 19)	-. 8527 *** (. 03)	-. 0337 (. 23)
2006	. 0075 (. 20)	. 2455 *** (. 03)	. 1346 (. 23)
2007	. 2727 (. 20)		. 3708 (. 24)
常数项	-3. 795 *** (. 94)	-. 6119 *** (. 18)	3. 334 *** (1. 11)
N	3775	2904	3741
R ²	. 0473	. 5445	. 0205

注: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在模型 1 和模型 3 中, 2001 年数据由于数据多重共线性而删除。* p < 0. 1, **p < 0. 05, ***p < 0. 01。

六、结论和讨论

在传统的多元化研究中,公司战略几乎完全是以企业为中心的,而很少考虑外部制度因素的影响。本文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组织分析视角出发,探索制度环境如何影响多元化战略,特别是国家和资本市场在形塑公司战略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无论是中国公司的多元化还是之后的去多元化,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国家政策驱动的;中国新生的资本市场对公司战略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此外,本研究发现中国多元化和绩效之间的关系远比既有理论预测的要复杂。中国公司多元化对股票回报率的显著负向作用,反驳了肯纳和派勒普(Khanna & Palepu, 2000)关于多元化创造股东价值的理论,表明即使在新兴经济体中多元化的收益也不足以抵消其巨大成本和负面效应。与代理理论和各种管理理论的预测相反,本文发现多元化在中国环境下对企业成长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这一独特现象用既有理论很难做出解释,但如果我们采用社会学制度视角来做分析,考虑中国高度分割的市场结构、地方保护、行业壁垒、基于关系的销售模式等因素便可能做出合理解释。在这种独特的制度环境中,企业如果要进入新的行业,就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和时间成本,在新行业中从头艰难建立客户关系,这必然导致销售效率大大下降。因此,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可能是解释为什么多元化会延缓企业成长速度的关键因素。总之,中国案例打破了“多元化总是企业规模扩张的一项有效战略”的神话。

尽管事实证明多元化并不利于公司绩效,我国企业还是争先恐后地实施多元化战略,并使我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企业多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的多元化发展更多的是取决于制度过程,而非经济过程。本文以新制度主义公司战略理论来阐明这种制度过程,并试图展示这种新制度主义视角为我们理解中国公司的多元化和去多元化提供了一种更丰厚的理论解释。

本文的核心论点是国家和资本市场这两大外部制度力量利用其政治和市场权力推行一种“最佳”(the best)或“理想”(ideal)公司战略,迫使企业去采纳新的组织形式以符合“最佳”公司战略的特征。“最佳”公司战略是由国家、资本市场、大公司、财经学术界和商业媒体等重要行动者共同建构的结果,在不同时期,其表现形式不一样。比如在

1960-70年代,多元化是“最佳”公司战略并被制度化,而到了1980-90年代,专业化成为主导战略,于是专业化成为“最佳”公司战略并被广为效仿。^① 这些“最佳”公司战略首先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产生,随后通过全球化及三种“制度同构”机制——强制性同构(coercive isomorphism)、模仿性同构(mimetic isomorphism)和规范性同构(normative isomorphism)——在世界各国广为扩散并被制度化。以我国为例,我国政府官员、学者、企业领导人、财经记者等先后受当时世界上盛行的多元化和专业化战略的影响(组织实践的跨国传播阶段,主要通过模仿性和规范性同构机制),然后利用其政治、经济及话语权力,通过政策制定、学术论证和媒体宣传等促成企业战略行为的改变(组织实践的国内扩散阶段,强制性、规范性和模仿性同构同时发挥作用,但由于政府在我国的主导作用,强制性同构在促成我国企业战略改变方面发挥

- ① 这种“最佳”公司模式的社会建构性在公司治理领域也体现得很明显。世界主要公司治理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以英美为代表的“英美模式”(the Anglo-American Model)和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德日模式”(the German-Japanese Model)。早期公司治理学者认为美式公司的分散所有制结构(dispersed ownership)及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使其比那些家族公司、国有公司、银行主导的企业集团及工人合作社都更有“效率”、更为“现代”,因此美式公司治理模式将不可避免地在世界上广为扩散(Berle & Means, 1932)。由于美国经济在二战后至1970年代一直在世界占主导地位,因此美式公司治理模式确实在这段时期被誉为国际最佳惯例(the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并被其他国家大力效仿。然而,从1960年代起到1980年代,德国和日本经济崛起,对美国经济造成了极大挑战,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很多德国和日本公司的管理模式和组织实践被认为是优于美国公司的(比如著名的“丰田模式”)。德日公司模式因而被世界很多国家所效仿,甚至很多美国公司也纷纷引进德日“先进”管理和组织模式(Kester, 1996)。1980-1990年代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及金融市场全球化和资产管理行业的兴起,特别是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的衰落,引发了另一轮对美式公司治理模式的推崇,商界和学术界再次预测其他国家将效仿美国,因为他们认为美式公司治理是优于其他公司治理模式的全球最佳模式(Shleifer & Vishny, 1997)。但好景不长,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引起世人对美式公司治理模式的深深怀疑和不信任,美式公司治理模式又一次深陷危机,并有可能引发“去美国化”的风潮。由此可见,某种公司模式被其他公司、其他国家广为效仿,更多的并非因为其超越时空和制度环境的“绝对效率”,而是基于其在某段特定时空范围的“相对表现”。因此,即使在“最理性”的公司行为领域,也并不存在一个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所声称的“客观”的“最佳模式”,如果有的话,这种“最佳”或“理想”模式也更多的是一种“事后解释”,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某种模式在某段时期表现最优,人们便对其进行理论化和事后解释,声称该模式之所以表现最好是因为它是理论上的“最佳模式”或“理想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循环论证);而当该模式表现不佳时,人们便对其进行“负向论证”,用各种理论和事实论证其为什么不是最佳模式而应该被抛弃,同时又对新出现的“最佳模式”进行理论论证,以赋予其正当性和科学性。总之,组织理性的这种社会建构性和事后解释性决定了某种组织模式被广为效仿和扩散更多的是因为其被社会和制度环境定义为“正当的”、“高效的”和“先进的”,而非因为其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先进性”和“高效性”。

了更大、更有力的作用)。总的来讲,新型国际管理和组织实践在我国的传播一般要经过两个阶段、通过三种制度机制完成。本文主要揭示了由国家和资本市场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同构机制在我国企业多元化和去多元化过程中的作用。

由于我们把企业外部制度压力看作是推动中国企业战略变化的主要力量,我们期望看到那些受国家和资本市场影响更大的企业也更能实施多元化或去多元化战略。本文的定量及定性数据都证明了这种新制度主义公司战略观的正确性和解释力:作为对国家和资本市场所推崇的专业化“最佳”公司模式的回应,中国上市公司近年来普遍出现了去多元化、回归专业化的趋势,但那些受国家和资本市场影响更大的公司——比如有股比例更高、行政级别更高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更高的公司——去多元化的程度更深、回归专业化的步伐更快。

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本文试图以社会学视角与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在组织研究领域进行对话。对比经济学理性主义视角和社会学新制度主义解释,不难看出,这两种多元化理论观在以下四个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1)多元化的原因:前者强调效率和理性,而后者着重权力和合法性的作用。(2)多元化的扩散主体(diffusion agents):前者认为是公司自身理性决策的结果,而后者认为国家和专业人士在形塑公司战略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3)扩散机制(diffusion mechanisms):前者认为是市场竞争机制迫使公司采用多元化这种最利于效率最大化的战略以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并获胜,而后者认为多元化的盛行主要是通过迪马吉奥和鲍威尔(DiMaggio & Powell, 1983)提出的三种“制度同构”机制进行大规模扩散,即强制性同构、模仿性同构和规范性同构。(4)多元化的后果:前者认为多元化将导致公司效率的提升,而后者认为多元化并不一定会提高公司绩效,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损害公司价值,但由于多元化战略的广泛实施及由此带来的合法性和理所当然性(taken-for-grantedness),奉行该战略会使公司获得合法性收益,满足国家、资本市场等重要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要求,推行该战略的公司管理层等掌权者也会获取权力、经济利益等多项收益。本文经验分析证明了在上述所有四个方面,中国企业的多元化和去多元化历程都更契合新制度主义的解释框架,而那些效率导向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的解释力则远逊一筹。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新制度主义公司战略观并非完全否定

“理性”和“效率”在企业多元化决策中的作用,而只是试图修正、拓展经济学家所假设的“绝对”理性观和效率观。经济学所定义的理性和效率是一种内生的“绝对”理性和效率,不随外在时空、制度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与此相反,社会学认为理性和效率也是一种社会建构(socially constructed rationality and efficiency),会随不同时空、外在制度条件的变化而被重新定义(redefinition of rationality and efficiency)。因此,看似最客观的“理性”和“效率”也是一种社会过程的产物,是一种在复杂制度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建构。比如,关于多元化和公司业绩的关系,虽然有很多实证研究但并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基于西方国家的研究显示有四种可能:多元化和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关系、没有显著关系、负向关系、或倒U型关系(参见本文第三部分第四节“多元化和公司绩效”)。也就是说,至少从纯粹“理性”上来看,多元化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并不明确,并没有一致的研究结论表明多元化一定不利于公司业绩,但多元化战略自1980年代以来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是被污名化和去制度化了(deinstitutionalization),失去了合法性和正当性,导致各大公司纷纷去多元化,而不管到底去多元化和回归专业化是否真的对公司业绩有利(从组织决策上来说,在实际结果出来之前,也无法提前知道业绩结果)。因此,企业进行去多元化更多的是由于外在制度压力(比如国家和资本市场)以及对行业领导者或公司同伴的模仿,尤其是在不确定性比较大和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下。在多元化失去正当性,而专业化日益盛行并被众多公司采用后,那些多元化公司实施去多元化就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因为就算这些多元化公司业绩很好,但迫于资本市场、国家等强大的外部制度压力(比如证券分析师会调低其估值,即使其财务指标很好),如果继续坚持多元化反而显得“不理性”。显然,在这一过程中,公司理性被外部制度环境重新定义,公司行为也随之改变,一切都显得很“理性”,但这是一种被社会建构了的“建构理性”。

此外,“效率”也是一种社会建构。譬如,本研究发现,多元化并没有显著降低企业利润率,但却对股票回报率造成了显著负面影响(参见表3)。虽然一般而言,企业利润率越高,其股市表现越好,但这两种“效率”指标的生成机制有所不同。利润率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客观性”,而股票回报率却具有相当程度上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或社会建构性:股票价格受投资者和证券分析师等影响较大,当某只股

票受部分投资者追捧时,会刺激更多投资者跟进,从而推动价格进一步上涨;反之,当该股票受部分投资者抛售时,会刺激更多投资者恐慌性抛售,从而加剧价格下跌。此外,证券分析师们的看法对股票价格影响很大,由于多元化在资本市场失去正当性,证券分析师会调低多元化公司的估值,从而导致多元化公司的股市表现远远不如专业化公司,即使其利润率与专业化公司相比并无显著差异(Zuckerman,1999)。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很多组织行为实质上是“建构理性”,甚至是“非理性”的产物,但企业界、经济学和管理学界往往会对其进行“绝对”理性化包装,使这些“建构理性”、“非理性”的组织行为披上一层“绝对理性”的外衣以求得正当性和“科学性”。而在社会学家看来,有太多的组织行为是以“科学”、“理性”或“效率最大化”为名,实际上却被用来增强组织的稳定性、合法性及巩固相关行动者的权力(Fligstein,1991; Roy, 1997; Perrow 2002)。

总的来看,中国案例证明公司战略与公司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并主要通过诸如强制和模仿这样的制度机制扩散和传播。本研究深化了我们对外部制度环境如何塑造公司内部结构的理解,特别是阐明了国家和资本市场作为现代世界最重要的两个外部制度压力来源在组织趋同和变革中的关键角色。从更高的理论层面来讲,本文试图与经济学、管理学等以“理性”、“效率”为导向的组织研究范式进行对话,揭示“权力”及“合法性”在组织变迁中的重要作用。公司战略看似是最理性的市场行为,实则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受外在制度环境的强烈影响。因此,公司战略的社会学分析对理解公司行为和现代市场经济非常必要,也是值得社会学家探索的一个新的重要领域。

参考文献:

- 陈清泰、吴敬琏、谢伏瞻主编,1999,《国企改革攻坚15题》,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 樊纲,1996,《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 家路美,2008,《央企整合剥离金融地产 接盘者“想吃又怕烫”》,《证券日报》8月28日。
- 李培林、张翼,2007,《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吴敬琏、张军扩、刘世锦、陈小洪,1998,《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 武孝武,2007,《主业为王》,《上海国资》12月22日。
- 张维迎,1999,《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朱江雄,2005,《央企定身》,《中国投资》1月5日。
- Barboza, David & Keith Bradsher 2010, “In Disclosure to S. E. C. , China Lists \$ 9.6 Billion in

- Shares of U. S. Companies. ” *The New York Times*(February 9) .
- Barney , J. 1991, “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 *Journal of Management* 7.
- Baron J. N. , F. Dobbin & P. D. Jennings 1986, “War and Peace: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in U. S. Industry.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
- Berle , A. & G. C. Means 1932 ,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MacMillan.
- Boyd , B. K. , S. Gove & M. A. Hitt 2005, “Consequences of Measurement Problem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 ”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6(4) .
- Campa , J. M. & S. Kedia 2002, “Explaining the Diversification Discount. ” *Journal of Finance* 57.
- Chandler , Alfred D. 1962 , *Strategy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 MA: MIT Press.
- Chang , S. J. & J. Hong 2002, “How Much Does the Business Group Matter in Korea?”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3(3) .
- Coase , Ronald 1937, “The Nature of the Firm. ” *Economica* 16.
- Cole , R. 1989 , *Strategies for Learning: Small Group Activities in American , Japanese , and Swedish Industry*. Berkeley ,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avis , G. , K. A. Diekmann & C. Tinsley 1994,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Conglomerate Firm in the 1980s: The Deinstitutionalization of an Organizational Form.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9.
- Denis , D. J. , D. K. Denis & A. Sarin 1997, “Agency Problems , Equity Ownership , and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 *Journal of Finance* 52.
- DiMaggio , P. & W. Powell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
- Fan , Joseph P. H. , J. Huang , F. Oberholzer-Gee , Troy D. Smith & Mengxin Zhao 2007, “Diversification of Chinese Companies—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Strategy Unit Working Paper No. 08 - 007.
- Fligstein , Neil 1985, “The Spread of the Multidivisional Form among Large Firms , 1919 - 1979.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
- 1987, “The Intraorganizational Power Struggle: Rise of Finance Personnel to Top Leadership in Large Corporations , 1919 - 1979. ”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2.
- 1991,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Industry: An Institutional Account of the Causes of Diversification in the Largest Firms , 1919 - 1979. ” In W. Powell & P. DiMaggio (eds.) ,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alai , D. & R. Masulis 1976, “The Option Pricing Model and the Risk Factor of Stock. ”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
- Gedajlovic , E. 1993, “Ownership Strategy and Performance: Is the Dichotomy Sufficient?” *Organization Studies* 14(5) .

- Guillen , Mauro 1994 , *Models of Management: Work , Authority and Organization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uthrie , Douglas 1997, "Between Markets and Politics: Organizational Responses to Reform in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2.
- Hoskisson , R. E. & T. Turk 1990,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Governance and Control Limits of the Internal Marke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5(3) .
- Jensen , Michael C. & Kevin Murphy 1990 , "Performance Pay and Top – Management Incentiv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 Keister , L. 1998, "Engineering Growth: Business Group Structure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China's Transition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
- Kester , W. C. 1996, "American and Japanese Corporate Governance: Converging to Best Practice?" In S. Berger & R. Dore (eds.) , *National Diversity and Global Capitalism*. Ithaca ,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Khanna , T. & K. Palepu 1997, "Why Focused Strategies May be Wrong for Emerging Market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5.
- 2000, "Is Group Affiliation Profitable in Emerging Markets? An Analysis of Diversified Indian Business Groups." *Journal of Finance* 55(2) .
- Khanna , T. & J. Rivkin 2001, "Estimating the Performance Effects of Business Groups in Emerging Market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2.
- Lang , L. H. P. & R. M. Stulz 1994, "Tobin's Q ,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 and Firm Perform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2.
- Li , Shaomin , Mingfang Li & Justin Tan 1998, "Understanding Diversification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A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Management Studies* 7.
- Lins , Karl V. & Henri Servaes 2002, "Is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Beneficial in Emerging Markets?" *Financial Management* 31.
- Martin , J. D. & A. Sayrak 2003,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and Shareholder Value: A Survey of Recent Literature."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9(1) .
- Meyer , John W. & Brian Rowan 1977,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 (2) .
- Mintzberg , H. 1988, "Generic Strategies: Toward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Advance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5.
- Montgomery , Cynthia A. 1982 , "The Measurement of Firm Diversification: Some New Empirical Eviden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5.
- Nee , Victor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 Palich , L. , L. Cardinal & C. Miller 2000, "Curvilinearity in the Diversification Performance Linkage: An Examination of over Three Decades of Research."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1 (2) .
- Perrow , Charles 2002 , *Organizing America: Wealth , Power , and the Origins of Corporate Capital-*

- 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amaswamy, Kannan & Mingfang Li 2001, "Foreign Investors, Foreign Directors and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Large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in Indi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18.
- Roy, William 1997, *Socializing Capital: The Rise of the Large Industrial Corporation In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umult, R. P. 1974, *Strategy,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 1982,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and Profitabilit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4).
- Shieh, S. 1999, "Is Bigger Better?" *China Business Review* 26.
- Shleifer, A. & R. Vishny 1997, "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Journal of Finance* 52.
- Stearns J. B. & M. S. Mizruchi 1993, "Board Composition and Corporate Financing: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Representation on Borrow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6 (3).
- Teece, David J., Gary Pisano & Amy Shuen 1997,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8.
- Villalonga, B. 2004, "Diversification Discount or Premium? New Evidence from the Business Information Tracking Series." *Journal of Finance* 59.
- Walder, Andrew 1995,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
- Williamson, Oliver 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New York: Free Press.
- 1985,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 Firms, Markets, Relational Contracting*. New York: Free Press.
- Zuckerman, Ezra 1999,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 Securities Analysts and the Illegitimacy Discou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
- 2000, "Focusing the Corporate Product: Securities Analysts and De-Diversific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5.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张宛丽

class position and voting behavior ,but also explicates the causal mechanisms between class position and voting behavior through class identification.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class politics offers an appropriate logic to underst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Judicial Spanning of Legal Structural Holes: Social network analyses of closely related groups' legal management *Zhang Hongtao* 59

Abstract: When judges (laws) face villagers and its closely related groups ,there is no structural hole among villagers while legal structural holes do exist on the side of judges or laws , which puts judges (laws) at disadvantage in the network. Being constrained by the distribution of legal structural holes , judges (laws) have the village heads ,customary laws and mediation embedded into dispute resolution tactics to change their dis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the network and improve structural autonomy by filling up the legal structural holes. When the applicable objects of law are stranger groups , judges (laws) can improve structure autonomy by using the structural holes of the applicable objects. But even then judges (laws) are not in the best position ,where legal structural holes are not around them ,but on the side of the applicable objects of law. Hence the most urgent task for China's rule of law is to realize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particular Chinese factors and enacted laws ,so as to fill up the legal structural holes ,increase judges' structural autonomy and make laws more appropriate for closely related groups or stranger groups.

The Industrial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Strategy under Expanded Clinical Perspective: Targeting new employees of Factory D in Guangdong Province *Zheng Guanghuai & Liu Yan* 83

Abstract: With the intension of industrial conflic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 as the bridge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 the industrial social work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Based on the expanded clinical perspective proposed by Balgopal and the social work practice of Factory D in Guangdong province ,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strategy for new employees in order to change the person and the occupational environment simultaneously.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challenges faced by social work profession when social workers practiced in the world of work and argues that the industrial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for new employees can reduce the high turnover rate of employees and will bring a new possibil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ocial work in China.

The State , the Financial Market an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in China: A new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on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676 Chinese publicly-traded companies (2000–2007),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corporate diversification. Different from conventional efficiency-based studies on corporate strategy, this research examines diversification from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and investigates how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shapes corporate strategy. Specifically, the author focuses on the role of state and financial market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iffusion of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in China. The study finds that both the high level of diversification and later de-diversification of Chinese firms are largely driven by state policies. The result also shows that Chines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have substantial influence on firm strategy. This paper find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s of diversification on stock return and firm growth. Despite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versification and performance, Chinese firms have diversified to the highest level among the major economies in the world, implying that diversification was spread more through institutional than economic processes in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uccess tracking rates in panel survey in China. Based on the ecological mark-recapture theory, this research develops a method that decomposes non-ignorable sample attrition rates into survival rate and recruitment rate with Bayesian statistics. The proposed method is used to obtain the survival rates and recruitment rates of the eight-wave panel survey—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Panel Survey. The sample attrition urban-rural differences assump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ssumption and life cycle assumption are confirmed on both household level and individual level. At the end, this paper proposes suggestions on how to reduce sample attrition rates.

Abstract: In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many researchers focused on individual level determinant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while neglected the effects of regional level factors on environmental concern.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try to apply a two-level-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to sort out the significant municipal level effects from the effects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s expected, 5% variance can be explained by municipal level factor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income, age, education and gender a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environmental concern on the individual level; at the municipal level, post-materialist value, city type and GDP per capita